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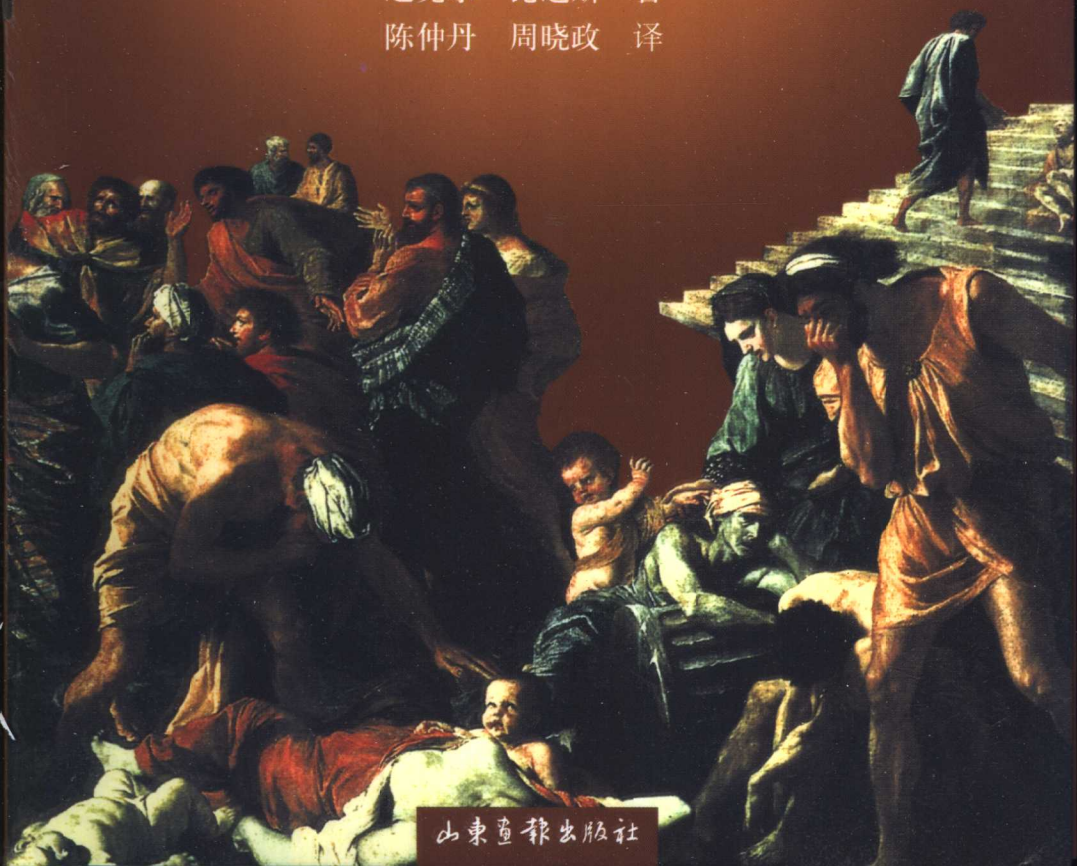
DISEASE &
HISTORY

疾病改变历史

[英]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

迈克尔·比迪斯 著

陈仲丹 周晓政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疾病改变历史

[英]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

迈克尔·比迪斯 著

陈仲丹 周晓政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5-2002-1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疾病改变历史/[英]卡特赖特,[英]比迪斯著;陈仲丹等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2

ISBN 7-80603-800-0

I. 疾... II. ①卡... ②比... ③陈... III. 疾病—影响—历史 IV. 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0620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utton Publishing under the title 'Disease & History'

Copyright © Frederick Cartwright & Michael Biddiss, 1972, 2000.

The Author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付 红

特邀编辑 张元立

装帧设计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45 × 208 毫米

9.125 印张 彩图 20 幅 黑白图 11 幅 1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英文版序

本书是1972年初版的增补本，并做了全面修订。初版本曾印了多次，并被译为法文和日文。与初版本一样，这一新版本也是一位医生与一位历史学者不断讨论和合作的成果，我们每人都注重向一般读者介绍他们可以理解的内容，讲述疾病对过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方式。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有机会更全面地涉及到一些专题，尤其是谈到了天花、流感和肺结核所造成的影响。在结论部分，有关当代关注的问题全部是重写，特别是现在的一些生态问题以及艾滋病在全球造成的悲剧。在准备这一新版本时，我们从简·克朗普顿、萨拉·库克、伊丽莎白·贝里和安德鲁·劳尼所提的建议和帮助中获益匪浅。我们尤其要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使《疾病改变历史》的修订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

迈克尔·比迪斯

中文版序

这是我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所写的最后一本书。他于2001年11月去世，享年92岁，结束了他作为医生和医学史家漫长、出色的一生。我知道，假如他现在仍健在，他会与我分享我们合著的《疾病改变历史》的中文版出版所带来的极大喜悦。这一翻译工作是由陈仲丹教授所做的。1997年，我作为历史学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时曾有机会与他见面。感谢他为我与卡特赖特医生合作的成果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所做的所有工作。

迈克尔·比迪斯

目 录

英文版序	1
中文版序	2
导 论 疾病与历史	1
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疾病	5
第二章 黑死病	25
第三章 梅毒之谜	47
第四章 天花：被征服的征服者	71
第五章 拿破仑将军与斑疹伤寒将军	93
第六章 霍乱与卫生改革	121
第七章 杜松子酒、流感与肺结核	141
第八章 蚊蝇、旅行与探险	165
第九章 维多利亚女王与俄国君主制的覆灭	187
第十章 暴民瘧症与大众暗示	213
结 论 现在尚存的问题	231
索 引	245
译者后记	263

导 论

疾病与历史

历史学家与医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承认人类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也都特别关注生存条件对人的影响。编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要研究历史学家和医生不可避免地共同面临的一个领域，即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在医学诊断中，引起疾病的原因常常是单一的，而在探讨历史时，原因就可能是复杂的。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首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但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段，尤其是在其重要性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时候。

我们从曾给世界带来苦难的众多疾患中选出一些案例进行研究，目的就是要说明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因此，这一研究与历史有关，不管历史是被当作伟大人物的史诗，还是被当作有关社会条件和人类整体发展的故事。那些危害文明人的病痛与对它的预防、治疗一样，都是文明的

组成部分。假如疾病本身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那么征服疾病的重要性也不会低。诚如我们所见，尽管这种征服只是部分的征服，其本身也会带来不小的让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与我们研究的专题有关。

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有关原始人在洞穴中独居的描述是在误导人。家庭单位逐渐发展成为过着共同生活的部落。藤蔓纠葛、杳无人迹的森林使得交往很不方便，这些小规模部落坐落在人工廓清的空地上，而且各住地之间极少甚或没有联系。至今在遥远的丛林地区还存在着少数几个这样的部落。每个部落都自给自足，依赖天然生成的食物资源生活。例如，在中非，香蕉和木薯是他们的主食，间或吃少量的棕榈油，人们很少有肉吃，无论是人肉还是动物的肉。这些部落社区的敌人有蛇、食肉动物以及善用毒箭的矮人。生育时的产褥热、婴儿的高死亡率以及像昏睡病和雅司病（yaws，由感染雅司螺旋体而得的一种病，皮肤损害像梅毒，主要流行于热带地区——译者注）这样的流行病，也使得人口不能快速增长。人的寿命不长，部分原因是对已有的病症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部分原因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饮食使得脂肪渗入主要器官而过早肥胖。因而，部落的增长几乎是静态的，在有利健康的季节出生数目超过死亡数目时，人口就增加，在死亡率高时，人口就减少。这就是原始部落缓慢增长的自然过程，食物足以果腹，并能抵御大的灾难，但不能对付生育和疾病的风险。

饥荒、战争或是疫病这样的灾难只是从外部来打击土著居民。蝗虫落在谷物上会造成饥荒，来自北非和东非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会突然攻击某个村子，把人带走当奴隶。后来，白人带来了对他自己无害、但对先天或后天缺乏抵抗力的土著居民却是致命的新疾病。

数千年前，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民族开始从这些自给自足的社区中产生出来，但遭遇大灾难的机会也随之成倍增

加。较高程度的文明使人们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和较全面、丰富的精神生活，但也带来了灾难。当更多的人从中心地区迁往开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时，与陌生疾病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小径变成了道路，旅行更方便、快捷，新的疾病也会通过这样的道路传播开来，侵袭没有相应抵抗力的居民。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由于城市居民必须依靠外来的食品供应，在食品供应不上时，饥荒就无法避免，因为没有天然资源可以取而代之。饥饿、扩充生存空间或仅仅是某一酋长对权力的要求，都会使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开战，因此人类有三个规模不断扩张的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启示录》中的三骑士，在他的灰马上有死亡（此处用典可参阅《圣经·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的有关内容：“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译者注）。

瘟疫、饥荒和战争相互作用，造成了一连串后果。战争使得农民离开土地并毁了其谷物；谷物被毁造成饥荒；挨饿体弱的人们又很容易成为瘟疫的牺牲品。这三种都是疾病：瘟疫是人体的失调，饥荒是作物和牲畜的失调——或是恶劣天气导致的恶果，或是更直接的病虫害侵袭所致；而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大众精神的失调，是对公认行为的一种背离。在下面的几章中，有关饥荒和战争的疾病肯定有所提及，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那些直接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身体疾患。

3

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疾病

5

与文明有关的疾病的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因为这种文明在保存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已经存在。有关疾病及其某时产生严重后果的记录在人类发展的相当早的阶段就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医学教科书——中国的《神农本草》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在韦尔科姆历史博物馆有一枚巴比伦的医生印章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在埃伯斯纸草书中提到过流行热病,这一纸草书是1862年格奥尔格·埃伯斯在底比斯的一座墓穴中发现的。纸草书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但大部分内容可能是更古老文献的抄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据记载有一种疫病在公元前1500年肆虐埃及,杀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头生子,从在位法老的头生子到地牢中囚徒的头生子,以及所有的头生牲畜。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是上帝为劝法老允诺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身上的最后一个可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40年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战争—瘟疫的序列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载。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丁人开战，被打败。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丁人开战，但又遭受失败。腓力斯丁人掳获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爆发了疫病。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伦，这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七个月的苦难后，腓力斯丁人得出结论，他们惟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被送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示麦人观看了约柜，因此遭到了一次大瘟疫的惩罚。疫病似乎传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约五万人。

- 6 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鼎盛时期。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和萨拉米斯的大海战中，这个希腊小国打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462年。在他统治时，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着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一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间的内部斗争。斯巴达是有优秀陆军但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军但陆军较弱的海上强国。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是攻不破的，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的供应，她就可以既不用在陆上交战，又不会因挨饿而屈服。在陆地上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她就能不费多大力气打败斯巴达。在战争的第一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她在陆上的防御政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墙里，受到包围。

灾难在公元前430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传到埃及，再由船经过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



公元前 430 年的雅典瘟疫，弗兰芒（荷兰）画家迈克尔·斯威茨（1624—1664）作。画面采用了常见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

虐了很短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 $1/3$ 的人口死亡，或许是 $2/3$ 。更可怕的是灾难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崩溃，在疾疫大流行时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修昔底德描述了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对神，他们认为敬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对于人为的法律，没有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时。”修昔底德还提到，即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

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攻占斯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军刚扬帆时——准确地说是刚划桨时——瘟疫就在船上流行开来，来势之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皮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

“瘟疫不仅夺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他被认为在公元前429年死于疫病。

7 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症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包括富人和穷人。医生们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大批因此而死。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是的疾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种已消失了很长时间的疾病。但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一疫症也就特别有爆炸性。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幸存下来的人已逐渐增强了抵抗力，所以这一疾病也就不再那么致命。

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这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27年，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告终。雅典的海军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马帝国的覆灭。对帝国覆灭的原因，历史学家过去争论了许多年。我们在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

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300年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19世纪中期才再次发展到这一水平。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

(Cloaca Maxima) 在公元前 6 世纪开始动工, 发挥着现代下水道的的作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 79 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掉的庞培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 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各喷水柜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统。约在公元 70 年韦伯芎皇帝统治时, 在罗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 人们进去要付一点钱。与之相比, 伦敦直到 1851 年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年, 在贝德福德街为女士、在舰队街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 收费为“如厕”(lavatory privileges) 2 便士, 一条热毛巾 4 便士。建造费用化了 680 镑。尽管这些厕所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 但在 5 个月内上厕所的收费就有 2470 镑。

清洁依靠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 312 年就有了第一条将洁净水送进城中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六条水道, 到 100 年后有十条水道每天供应 2.5 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其中一半的水, 剩下的供应 200 万居民每人 50 加仑。这一数量是今天伦敦或纽约一个市民的用水量。1954 年, 这些水道中的四条得到维修, 被用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 200 年起就可一次供 1600 名浴客使用。80 年后戴克里先时建的浴场房间超过 3000 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 伴随着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播, 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登今天仍以疗养温泉享有盛名。

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和房屋肮脏的城区。其中几乎有 2/3 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比 1666 年大火后的伦敦幸运的是, 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一座有着笔直、宽敞的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政官监督公共道路的清洁工作, 他们还负责控制食物供应, 制订条规以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和优质。其他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 这

就使罗马人普遍采用更卫生的火葬制。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9 与中世纪的巴黎或18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水方面，罗马与20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个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容忍一个17世纪的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看来是洁净的水，假如恰巧来自一个被污染的水源，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漫长的遭受瘟疫肆虐的衰败年代，这种缺乏基本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有关卫生的措施全然无效。

可以把罗马想像为坐在网中央的一只臃肿的蜘蛛。在罗马扩张的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又从东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濒临海洋，南面和东面邻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着不太开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战略要地的驻军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军团修筑的笔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马。

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军队也遭到那里居民的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着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的防治传染病的手段。假如相关的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一个

世纪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在公元前1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似乎在罗马附近的低湿地区流行,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造成大流行。传染范围好像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整个地区都被抛荒,成为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直到19世纪末情况才有所改观。

虽然同样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疟疾,一度在整个被征服地区出生率不断上升时,意大利—罗马人成活胎儿的比率却在急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的疟疾引起了人们身体长时间患病和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使得国力衰退。到4世纪,有强大战斗力的军团不再由意大利人组成,不单是士兵,连军官也来自日耳曼部落。可能是疟疾而不是传说的从东方进口的堕落奢侈品,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 10

疟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个危险却来自遥远的东方。公元1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们压迫居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阿兰人的日耳曼部落、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发动了一场不留情的西迁运动,最终覆灭了罗马,将帝国分解为一批相互征战的国家。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种他们不知道的欧洲疾病。451—452年间,在阿提拉率领下,他们向西远达高卢和北意大利,但在入侵罗马城前就退了回来,其原因显然是遇到了传染疾病而不是防御战事。

安东尼疫病,有时又称盖伦医生疫病,164年初次在共治的皇帝卢西乌斯·维鲁斯驻扎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两年中,这一疾病局限于东方,给阿维狄乌斯·克劳狄指挥的一支军队